

# 回望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40年

## 访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吴志荣

□戴建国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新中国图书馆事业走过了40年的繁荣发展期。在这40年间涌现出了许多为图书馆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代表,吴志荣便是其中之一。1978年开始进入大学学习图书馆学的他,在该领域颇有建树,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和专著。在担任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和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图书馆馆长期间,既是图书馆管理者又是图书馆学研究者的吴志荣在治馆和治学方面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在投身图书馆工作的40年里,吴志荣见证了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见证着图书馆人的奋斗足迹。

### 传统图书馆

问:1978年开始,大量的青年学子陆续进入大学学习图书馆学,数量之多,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作为78级的一名学子,您为何会选择图书馆学专业?

吴志荣:当年,我也不清楚图书馆学是怎么回事,只是因为自己从小喜欢看书,觉得这个专业与图书馆有关,以后可以方便看书,但那时的我从未想过今后要在图书馆这个行业中或者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达到什么高度。不过由于性格使然以及学习能力尚可,我的学习成绩还不错。“图书馆学概论”和“中文工具书介绍”这两门核心课程的成绩都名列前茅,英语课程由于自小基础较好,加之在进校前有位长者曾长期对我进行个人辅导,成绩也一直处于班级上游水平,是班里的英语课代表(这也是我后来考研究生的一个优势)。

从宏观上看,77级、78级图书馆学专业学生的入学,是我国图书馆事业这四十年发展的前奏。

问:1984年,您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情报学系,师从孙云畴先生。读研期间,您在1986年连续公开发表了4篇论文。请问这一阶段的学习对您产生了哪些影响?

吴志荣:当时的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情报学系可谓人才济济,学术思想活跃,学术气氛浓厚,有孙云畴、陈誉、何金铎、罗友松等老一辈学者,有宓浩、祝希龄、刁维汉、黄纯元、周德明等中青年学者。我入学时,吴建中和陈修学已经毕业,王世伟、吴光伟等尚未毕业,同届同学有戴维民、温国强、章春野、张静波、于灵芝等,下一届有周德明、范井思、葛明、叶鹰、胡小菁等,再往下有刘炜、党跃武、慎金花、孙豪展等。这些师兄、师弟或师妹后来都成为我国图书馆界的翘楚。

三年的求学生涯,真的让我受益匪浅。我在1986年公开发表第一篇论文,即《非书资料编目剖析》,从此进入图书馆学研究领域。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十分活跃的时期,这得益于对西方相关图书馆学理论的引进和吸收,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界对以往的所谓“经验图书馆学”进行了批判,“知识交流说”成为解释图书馆活动现象的主流。华东师范大学图情系是“知识交流说”的发源地,受此影响,我发表了《论图书馆在社会信息交流网中的地位》,认为图书馆由于其信息交流活动所具有的特性,因而在社会信息交流网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当图书馆克服了影响其信息流动速度的某些制约因素后,它将在社会信息交流网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看来,“知识交流说”并不完善,但在当时,它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我攻读硕士的研究方向是“西文编目”,因此,在研读AACR2的基础上,确定了学位论文的题目为《非书资料编目研究》,论文运用比较的方法(中西比较以及书和非书的比较),对视听文献、缩微文献、计算机阅读文献以及实物文献的编目进行研究,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研究的空白,论文的内容基本都得以公开发表。

1991年我发表了《论非书资料的书目控制》,提出全面实现非书资料的书目控制的策略,而在1992年则发表了《论中西文编目课合一的科学性和必然性》。此后,由于我的工作性质发生了改变(1988年我担任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助理),学术兴趣开始转向,我对编目的研究就到此结束了。

然而,由于分编工作是图书馆的核心业务,通过以上的学习和研究,我对编目的各个方面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这也让我一直关注着分编工作的发展,为今后从事的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问:1982年前后,恢复高考后入学的一代人成为批判“经验图书馆学”的新力量,您是这其中的一分子吗?您发表的《关于我国图书馆职能理论的新思考》和《图书馆教育职能新论》也属于批判“经

验图书馆学”的范畴吗?您如何看待那时兴起的批判“经验图书馆学”的潮流?

吴志荣:严格来说,我并不属于批判“经验图书馆学”的新力量,仅仅是这个时期兴起的“知识交流说”理论建设的参与者,我那篇《论图书馆在社会信息交流网中的地位》的文章就是参与这一理论建设而形成的成果。不过,也由此引发了我后来一直保持的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兴趣。

我那两篇关于图书馆职能的论文也并不属于批判“经验图书馆学”(这股潮流那时已经退去)范畴,而是对当时已经基本形成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些理论的质疑或完善。其中一篇文章认为,“情报职能”理论是一种模糊的阐述,对文献信息进行筛选是图书馆的一个重要的基本职能(2015年我发表的论文《文献发现:当代图书馆重要的社会职责》,是对这种观点的进一步肯定。时隔二十多年,由于文献量急剧增长,文献冗余和污染现象日趋严重,进而愈加证明了这种观点的正确性);另一篇文章认为,图书馆实施的教育与课堂教育不同,它具有能实施反复教育、个别教育和买方教育等独特的性能,图书馆应该充分发挥这种特殊的教育性能,从而培养一种主动精神,做好吸引和指导读者的各项工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界不仅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取得很多成果,提升了图书馆学理论的层次,基本形成了我国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体系,也在其他方面取得很大进展,如以张琪玉为代表的检索语言研究领域和以肖自力为代表的文献资源建设研究领域。

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那股批判“经验图书馆学”的潮流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提升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层次,却也为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脱离图书馆实践留下了隐患。出现这股潮流的原因是,当时有一批青年学者力图使图书馆学研究摆脱图书馆这个机构。他们认为图书馆学不能以“图书馆”为研究对象,就如“医学”不以“医院”为研究对象,



“法学”不以“法院”为研究对象。最有代表性的是,当年有人提出的要建立“知识学”的观点受到了追捧,其实如果开展这种研究就会完全脱离图书馆学的范畴。因此,到了80年代后期,图书馆界出现了一些“反思”文章。

同时,我国的图书馆实践在改革开放后,得到很大发展,主要标志是:80年代中期前后,一大批大学新建了图书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包兆龙图书馆”;视听资料大量进入各类图书馆,图书馆也都相应地成立了视听部门或技术部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经开始了图书馆自动化的探索,是我国传统图书馆阶段向自动化图书馆阶段发展的先声。

问:谈到对图书馆学的反思,继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期之后,90年代又出现一股“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的思潮。您在1992年开始从哲学的角度来反思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并发表了《走出误区 巩固和发展80年代的研究成果》,您为何会选择这一视角?

吴志荣:我一直对哲学比较感兴趣,认为只有站在哲学的高度,才能了解事物的本质。如果站在哲学的高度来考察20世纪8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我们就不难发现,80年代初期和中期出现的现象属于传统的理论价值观念发生危机时产生的理论动荡,而90年代初出现的现象则属于理论研究本身脱离了科学的轨道。前者经过短暂的徘徊后,便进入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建设轨道,而后者则可悲地陷入了理论研究的误区,而且一时难以从误区中走出来。脱离的原因如上所述:在理论动荡时期,隐患便已经埋下。

问:您是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培养的首位研究生,学成之后回馆工作,1988年担任馆长助理,走上图书馆的领导岗位,身份的变化带给您怎样的思考和感悟?

吴志荣:我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既然读了这个专业,又从事了这个行业,就会十分用心地投入。

我研究生毕业后不久就被任

命为馆长助理,这种岗位上的调动,让我更关心图书馆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关注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从此,我成为一个既全力从事图书馆各项业务管理工作,同时又一直在进行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图书馆人。正因为我一直处于图书馆实践的前沿,所以能从实际出发,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领域的许多观点“不以为为然”,使得我相当多的研究论文都属于“反思”或“侧思”。我也逐渐感受到我国图书馆界的“学界”和“业界”存在显著差异。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图书馆事业由于经济原因,正在走向低谷(极大多数图书馆的购书经费大幅度下滑,“丢书保刊”成为很多图书馆的选择),而理论界却在发起“图书馆发展战略研究”,真是“南辕北辙”。又例如,由于信息产业发展是当时的社会热点,理论界又出现了一波“信息产业发展研究”的热潮(认为图书馆是信息产业的组成部分),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 自动化图书馆

问:1992年开始,市场经济蔚然成风,一些图书馆学人融入这一经济浪潮,当然也有一些中坚力量在思索着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的现状与未来。1993年,您晋升副研究馆员,同年升任副馆长,分管图书馆业务和科研工作,成为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具有图书馆学硕士学位的高校图书馆领导。在治馆过程中,您对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的发展有何看法?

吴志荣:20世纪90年代,因为国家步入了市场经济时代,各行业的经济待遇出现分化,其中文化教育行业很不景气。当时确实有很多图书馆人(包括一些有造诣的学者或专业人员)跳槽,去国外打工、经商、去外企工作。在这种形势下,创收成为各图书馆的一个重要任务。除了破墙开店或出租场地外,还开办各种培训班,甚至提出了一些服务项目也应该收费。因此,图书馆界出现有偿服务与无偿服务的争论。

(下转07版)